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  
*Original Research Paper*

December 2018

# 今日中國的非洲：初步觀察

王智明

台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wchimin@hotmail.com

## © 著作權聲明

本文著作權屬作者擁有。文章內容皆是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中心立場。除特別註明外，讀者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工作論文，作個人使用，並引用其中的內容。

徵引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工作論文系列文章，需遵照以下格式：作者，〈文章題目〉，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工作論文，文章編號，文章所在網址。

## © Copyright Information

The authors hold the copyright of the working papers.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e ICCS Working Paper Series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ose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Users may download the papers from ICCS website for personal use and cite the content,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Citation of the ICCS Working Paper Series should be made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Author, "Titl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 #, URL of the publication.

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R212 HA Building 2, 1001 University Road

Hsinchu, Taiwan

Tel: +886-3-5712121 Ext.58274, 58272

Fax: +886-3-5734450

Website: <http://iccs.nctu.edu.tw/en/wps.php>

Email: [iccs.wps@gmail.com](mailto:iccs.wps@gmail.com)

## 今日中國的非洲：初步觀察

王智明

台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wchimin@hotmail.com

### 摘要

隨著中國在非洲投資的加強，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以及中國人民前往非洲工作與旅遊的數量逐年攀升，「中非關係」已成為當前變動世局中的熱點之一。這都使得檢視中國的非洲想像——乃至對黑人的歧視——變成中非關係中無可迴避的課題。換句話說，「如何說好非洲故事」與「如何說好中國故事」是一體兩面，一如「中國在非洲」與「中國的非洲」是一個相互連動的過程，它們突顯的是「當中國深入世界」時，中國人的心靈與視野是否也能與之合拍的主體性拷問。如果「中國在非洲」是關於批判與辯護中國在非洲的行動——從掠奪土地、資源，到移民、基礎建設與債權——是否構成了「新殖民主義」的辯論，那麼「中國的非洲」則期待批判反思自我的非洲想像，以檢視在中國知識生產與主體形構裡的非洲究竟意味著什麼。這篇文章將以最近中國流行文化里的非洲形象為出發點，特別關注中國的旅行書寫如何表述非洲。雖然流行文化的再現未必能夠代表中國人對非洲的全部觀感，但是它們都指向了一個相對於非洲的中國主體。正是這個中國主體值得我們思考與分析。這樣的取徑並不只是為了批評中國的非洲再現犯了「東方主義」的毛病，而是要搶救那些反思的痕跡與瞬間，讓我們得以對非洲提出不同的想像，以「超越媒體的終局策略」，「打開深入研究的空間」，從「一個互嵌而且極度情境性的地理」(Simbao 2012) 中去想像與介入中非關係的未來。

新到非洲的每一個人都有潛力成為連鎖移民現象中的有力連結，將親戚、熟人、女朋友和配偶們帶到非洲。隨著時間過去，新到者的行為，他們和非洲人民建立起的關係，操辦業務的方式，對當地法律、習俗、環境以及人的尊敬或其缺乏，將決定中國的形象，甚至是中國與非洲的全面關係，其影響力將大於任何北京為了建立政府權力與強化國家名聲所精心策劃的行動。

—Howard French, *China's Second Continent* (2014), 6

只要我們可以超越媒體的終局策略，我們就可以打開深入研究的空間，而不只是專注在經濟上的利益或損失。我們需要更多、更具廣度的文化與藝術研究，以為中非關係的論辯增加有意義的面向。

—Ruth Simbao, "China Africa Relations" (2012), 7

中國崛起，尤其是 2013 年前後「一帶一路」倡議的出台，使得中國與非洲的關係（以下簡稱「中非關係」）成為西方以及中國媒體關注的焦點。前者通常以「黃禍」的角度觀之，認為中非關係的進展意味著中國對西方霸權的挑戰，也對非洲國家的主權、勞動條件與環境帶來破壞，乃至透過債權形成某種的「新殖民關係」。<sup>1</sup>後者則視之為一個關於未來的論述，中非關係的進程將為新的國際秩序的到來奠定基石，並為中國未來的發展鋪下坦途，因為中國絕不稱霸，只是打造互利雙贏的國際合作，投資基礎建設與國際貿易，推動非洲與世界的發展。<sup>2</sup>已故的非洲學者莫尤（Sam Moyo）就強調，中國再殖民非洲「是一個貧乏的概念，這種看法完全是在套用傳統的常規殖民秩序……，沒有體現當下的資源爭奪方式的差異」；同時，樂觀地看，中國的援助與投資不僅可以讓非洲「得到新的金融資助和形式，還包括對聯合國和國際金融體系轉型的預期」（99-100），何況在非洲徵用土地的主力是「美國、歐洲以及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的大量跨國公司」，而非中國，儘管中國製造佔據非洲零售市場、中國企業大量涉入非洲礦產、農業和建築領域，乃至因為待遇問題而造成中非衝突，也是鐵板釘釘的事實（102-3）。<sup>3</sup>

<sup>1</sup> 例如 Howard W. French, *China's Second Continent* (New York: Vintage, 2014) 就對中國在非洲的發展抱以負評，尤其強調中國移民對於非洲的影響以及對非洲人民的歧視。

<sup>2</sup> 例如張春，《走進非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就帶著樂觀的論調，從國家政策的角度來闡述過去 60 年中國在非洲的發展和境遇，並以「攜手共圓中、非夢」作為結論與展望。

<sup>3</sup> 薩姆·莫約著，林允柯譯，〈中國在非洲：「南南關係」展望〉，《人間思想》簡體版，第 6 期（2017），頁 97-108。

因此，在「一帶一路」的帶動下，中國的學術界開始關注中非關係，不僅許多研究中心應運而生、蓬勃發展，部分學者也開始關注在中國，特別是在廣州和義塢學習和做買賣的非洲人社群，<sup>4</sup>儘管中非關係，早在冷戰的年代，在 1955 年印尼萬隆亞非會議的基礎上，就一直在外交與援助上有所互動；在 2000 年「走出去」的政策推動下，國有企業開始到非洲積極進行投資與基礎建設，造橋鋪路、開礦墾荒，為當前的中非關係打下了重要的基礎。從冷戰時期反帝連帶的戰略同盟，到今天經貿與人員的密切往來，中非關係可以說也進入了新的時代。「中國在非洲」，究竟給非洲國家與人民帶來了「解救」還是「詛咒」？它是一種帝國與資本的複製，還是打開反思不結盟運動、重建「南南關係」的契機？這在中外媒體上成為了中非關係論辯的主軸。<sup>5</sup>

然而，當中國媒體和學界唱和著希望的旋律時，西方媒體似乎瀰漫著警醒的曲調。儘管中國政府、媒體與知識界對於中國的辯護不無道理，中非關係的最終發展也有待時間磨合來證明，但中國企圖向國際社會「說好中國故事」的同時，似乎忽略了中非關係當中的文化衝突可能造成的負面效應：不論是對在華非洲人社群的嚴格管控，或是中國媒體對非洲形象的刻意塑造，似乎都反映了長久以來，中國社會對於非洲的有限認識，乃至是誤識與歧視。尤其，近年來中國關於非洲的文化生產——從《戰狼 II》與《紅海行動》等大片到 2018 春節聯歡晚會上備受爭議的小品「同喜同樂」——將非洲呈現為中國行動的背景與對象，而非對等的主體；這些影視產品並且複製了西方媒體對非洲的主流想像：貧窮髒亂，又疾病肆虐，他們要不在低度開發中腐敗，製造恐怖襲擊，就是等著中國英雄或丈夫前來營救。因此，在我們稱頌或詆毀西方媒體對於中國在非洲的評價之前，或許我們應該先了解中國眼中的非洲是如何形成，又將如何與中國的未來發生關係。

這樣一個自省的出發點是必要的，因為非洲不僅是當前中國基建援助的前線，前往非洲旅遊的中國旅客亦逐年攀高。依中國旅遊公司攜程所做的一項消費調查顯示，「2018 年上半年，以商務出行為目的前往非洲的機票訂單佔總體赴非訂單的 15%，比去年同期增長 50% 以上。同時，今年前 7 月，通過攜程旅遊平台購買各類旅行產品前往非洲的遊客，比去年同期增長約 40%，模里西斯、肯亞、摩洛哥、南非、突尼斯都是中國遊客青睞的目的地」；中國旅遊研究院發布的數據則顯示，「過去三年中非雙邊入出

---

<sup>4</sup> 見博艾敦 (Adams Bodomo) 著，李安山，田開芳和李麗莎譯，《非洲人在中國：社會文化研究及其對非洲—中國關係的影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以及香港嶺南大學學者 Roberto Castillo 做的相關報導和研究：<https://africansinchina.net/tag/roberto-castillo/>。

<sup>5</sup> 例如黛博拉·布羅蒂加姆 (Deborah Brautigam) 著，沈曉雷、高明秀譯，《龍的禮物：中國在非洲的真實故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便為這個論辯，從外交援助與國際戰略的角度，提出了有利中國的辯護。李靜君 (Ching Kwan Lee)，*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則從資本，而不是資本主義的角度，解說中國資本在非洲造成的影響，反駁西方媒體認為中國是新帝國主義的說法。

境人數基本保持穩定，2017 年全年，中非雙邊旅客互訪達到 142.6 萬人次，其中，中國遊客旅非 79.78 萬人次，非洲遊客旅華 62.83 萬人次。<sup>6</sup>這意味中非關係將從物流、金流及外交的往來逐漸步入更密切的人際與文化交往；不只中國遊客將加入「中國在非洲」的大潮，提振非洲經濟、認識非洲文化，他們在非洲的經驗、憶述以及與非洲社會的互動也將成為「中國的非洲」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這幾年非洲遊記的高頻出現反映的就不只是中國民眾對非洲興趣增加，而是非洲想像的中國表述，正藉著文字和影像默默地加入了中非關係的建構行列。<sup>7</sup>在這個意義上，中非關係的新時代需要研究者有意識地走出「解救」或「詛咒」如此截然兩分的意識型態框架，或是超越「龍在莽原」的意象思維，<sup>8</sup>而進入更為細緻的關係研究當中，並且同時對自身的知識構成與認知框架提出反省。中歐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的學者拉吉 (Daniel Large) 就強調，中非研究的發展應該「超越在國家架構下分析經濟關係」這個層次，並轉向中非之間多元關係的開展如何影響了中國與非洲的發展 (60)。任教於南非羅德斯大學藝術系，同時也是國際刊物《非洲藝術》主編的學者辛包 (Ruth Simbao) 則指出中非關係是全球非洲想像的一環，它既指向「反向離散」(contra-flow diaspora) 的非洲全球運動，也提醒我們膝反應式的團結或偏見這類的概念，並無助於理解中非關係中的複雜動態。她認為，當前關於中非關係的論辯中，盲目的團結有時候被用來解釋非洲或中國的行動(端看論者是以「解救」或「詛咒」來看待中國在非洲的舉措)，而這類解釋對於我們理解或進行內部反思作用不大；因此，「複雜的研究和有意義的藝術作品不能簡單地在中非關係的論辯中選邊，而得要允許——甚至是尋找——在這類複合議題中無法避免、一定存在的矛盾」(2017: 5)。<sup>9</sup>

在辛包看來，所謂的「中國袋子」就具現了中非關係的矛盾。「這些袋子通常與被迫移動、難民身分以及貧窮相連繫，在非洲許多地方有不同名稱：中國袋子、辛巴威袋

---

<sup>6</sup> 引自田虎和連品潔，〈中國赴非游客量連年增長 非洲旅遊迎來發展黃金期〉，《人民網》旅遊頻道，2018 年 9 月 4 日：<http://travel.people.com.cn/n1/2018/0904/c41570-30271171.html>。亦可參見 Juergen T Steinmetz, "Tourism for Africa is now Top Destination for Chinese Tourists," *ETurboNews*, March 19 (2018): <https://www.eturbonews.com/180671/tourism-to-africa-is-new-top-destination-for-chinese-tourists>; Shi Yinglun, "China Focus: Into Africa, Chinese Tourists Charmed by Natural Beauty," *Xinhua News*, August 29, (2018):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8/29/c\\_137427958.htm](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8/29/c_137427958.htm)。

<sup>7</sup> 這也包括了許多官方紀錄片的出現，例如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張勇導演與製作，關於在華非洲人的《我從非洲來》(2018) 以及仍在製作中的《重走坦贊鐵路》。2018 年，新華社亦將推出名為《與非洲同行》的主題紀錄片；中央電視台 (CCTV 1) 亦將推出《中非合作新時代》的五集專題片，介紹中國如何通過合作項目的具體事例以及非方親身感受，展現中非合作真實親誠的理念，以及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改善民生發揮的作用。

<sup>8</sup> 見 Daniel Large, "Beyond 'Dragon in the Bush': The Study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African Affairs* 107/426 (2008): 45-61 對於中非研究的回顧與批評。關於中非研究領域的出現與展望，見 Chris Alden and Daniel Large, eds., *New Directions in Africa-China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18)。

<sup>9</sup> 見 Ruth Simbao, "China Africa Relations: Research Approaches," *African Arts* 45.2 (2012): 1-7。

子、土耳其皮箱、孟加拉袋，或在奈幾內亞叫做『迦納必須走』袋，因為 1983 年有大量的迦納難民逃離奈幾內亞」(2012: 6)。<sup>10</sup>換言之，雖然這些袋子不過是背景，並在不同的脈絡中有不同的指稱和意涵，但它與中國的關聯暗喻了非洲的中國認識與想像。或許這樣的想像連繫對中國與中國製造並不公平，我們也絕對可以找到其他的物件（例如華為手機或高鐵）作為反證，但是「中國袋子」終究表述了某一層次的中非關係與中國想像，而這正是中非研究者必須誠懇面對的。「中國袋子」的另一層意涵更值得我們深思。辛包說：這些袋子不僅指出便宜中國貨大量傾銷非洲的事實，它們也指向了 2005 年辛巴威政府「去除髒亂」的主張——即以都市更新與公共衛生之名掃除貧民窟的行動。這個造成數以百萬居民流離失所的舉措，據說是為了迎合總統慕加比「向東看」的政策，為中國企業的進駐掃除障礙 (Simbao 2012: 6-7)。思之於此，我們就不得不將中國袋子看做是中非關係的多重轉喻：一方面它象徵中國產品的質量以及中國經貿擴張的現實，另一方面它與難民和貧窮的連繫凝結了某種對中國在非投資的認識——這種認識與就業率或國民生產毛額的發展無關，而與非洲人民居住空間的破壞與改變相關。當然，發展本身難免帶來破壞，但是中國的發展如何不為非洲人民的生活造成災難性的破壞，當是思考中非關係的首要命題。能否守住這條底線，對於批判性的人文知識而言，自然是如何評價中非關係的重要判準；不然，去殖民化的知識生產又與殖民現代性的知識生產何異呢？是故，辛包提出了以下的重要提醒：

所有學者都得與他們作為知識生產者的現場搏鬥，承認去現場的、普世的或是全球的思想，在另類地緣政治這樣的去殖民概念中是有盲點的。在非本質化的意義上，「關注知識生產者，而不是知識對象」是一種實際的需要，目的是為了「置疑掌握知識本身的現代／殖民基礎」。(2017: 7)

以中國近年出版的非洲旅行書寫為研究對象也是類似的道理，因為旅行書寫本身即是一種知識生產的形式；它不僅暗含美國學者普拉特 (Mary Louise Pratt) 所說的「帝國之眼」，<sup>11</sup>它本身就是一個現代／殖民的現場，是一種以非洲為對象和場景的中國表述。對其深究不僅可以發覺國家敘事與主體敘事之間的貼合與縫隙，也可以看到非洲之於當前中國在自我追尋與探問中的位置。在中國遊客前往非洲旅遊高速成長的今天，我們可以預期未來將有更多的非洲遊記即將出版，新的文化碰撞將在這些非洲行旅中發生，

<sup>10</sup> 見 Ruth Simbao, "Situating Africa: An Alter-Geopolitics of Knowledge or *Chapungu Rises*," *African Arts* 50.2 (2017): 1-9。相關研究，亦可參考 Ying Cheng (程瑩), "'The Bag Is My Home': Recycling 'China Bags'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Art," *African Arts* 51.2 (2018): 18-31。

<sup>11</sup> 見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2<sup>nd</sup>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7)。

乃至成為中非關係的新熱點。這都使得檢視中國的非洲想像——乃至對黑人的歧視——變成中非關係中無可迴避的課題。換句話說，「如何說好非洲故事」與「如何說好中國故事」恰恰是一體兩面，一如「中國在非洲」與「中國的非洲」是一個相互連動的過程，它們突顯的是「當中國深入世界」時，中國人的心靈與視野是否也能與之合拍的主體性拷問。<sup>12</sup>如果「中國在非洲」是關於批判與辯護中國在非洲的行動——從掠奪土地、資源，到移民、基礎建設與債權——是否構成了「新殖民主義」的辯論，那麼「中國的非洲」則期待批判反思自我的非洲想像，以檢視在中國知識生產與主體形構裡的非洲究竟意味著什麼。

這篇文章將以最近中國流行文化裡的非洲形象為出發點，特別關注中國的旅行書寫如何表述非洲。雖然流行文化的再現未必能夠代表中國人對非洲的全部觀感，但是它們都指向了一個相對於非洲的中國主體。正是這個中國主體值得我們思考與分析。這樣的取徑並不只是為了批評中國的非洲再現犯了「東方主義」的毛病，而是要搶救那些反思的痕跡與瞬間，讓我們得以對非洲提出不同的想像，如辛包教授所建議的，以「超越媒體的終局策略」，「打開深入研究的空間」，從「一個互嵌而且極度情境性的地理」(2012) 中去想像與介入中非關係的未來。

### 沒有地方與不是地方：非洲一體？

2017 年是中國電影市場巨幅成長的一年。根據《綜藝》雜誌的調查，中國電影市場從每年 20 億的營收於 2017 年大幅成長為 86 億美元，<sup>13</sup>而當年度最賣座的電影——也是中國影史上最賣座的電影——就是吳京主演的《戰狼 II》。它在上映首四個月內就已獲得人民幣 567 億的票房收入。而名列第二的是在 2018 年一月上映的《紅海行動》。這兩部電影描述的都是中國在非洲的（非軍事）救援行動。雖然這兩部電影獨佔中國電影史鰲頭或許不過是意外，但它們都以中國在非洲救援僑民的行動為背景這一事實，卻值得關注與討論。

---

<sup>12</sup> 相關討論，見鈴木將久編，《當中國深入世界：東亞視角下的「中國崛起」》（香港：亞際書院，2016）。

<sup>13</sup> 見 Patrick Frater, “China Office Box Expands by \$2 Billion to Hit \$8.6 Billion in 2017,” *Variety* 2017/12/31: <https://variety.com/2017/film/asia/china-box-office-expands-by-2-billion-in-2017-1202650515/>。





毫無疑問，這兩部電影都具有明顯的愛國主義色彩，並以男子氣概為基調，而它們也受到中國政府與解放軍的大力支持。<sup>14</sup>它們向中國公民傳達了一個重要的訊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當你在海外遭遇危險，不要放棄！請記住，在你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宣揚愛國主義無可厚非，強調男子氣概就軍事與動作電影來說亦情有可原，但這兩部電影裡的非洲再現卻大有問題：不只是視非洲為戰亂、疾病、貧窮、危險之地這樣的刻板印象充斥全片，電影裡的非洲亦不存在任何的地方標記；觀影者除了透過刻板印象清楚地看見「非洲」之外，無法從非洲演員的穿著、使用的物品或地景辨別電影究竟指的是非洲哪裡？觀影者只看到了戰爭、爆炸、打鬥與救援在「非洲」發生，以及眾多無辜的非洲人民為之受害與犧牲，卻全然無法辨視這些受害者是誰，來自哪裡？他們雖有臉孔，但卻和「非洲」一樣，不過是這些中國救援故事的「背景」，而不是主角，沒有個性、姓氏、部族、國家。和「非洲」相同，他們也是被作用的對象，而非有自主意識的主體——沒有來處（placeless），亦無處可去（nowhere）——他們既是流離失所，也是被發明的他者。在這兩部電影裡，非洲被想像為一個整體，但它並不是一個有中心意識或思想的集體，而是被貧窮、疾病與政治動亂所擾動的一盤散沙。由此觀之，雖然中國在非洲造橋鋪路、大舉建設，在中國人眼裡，非洲仍是一片廣大而平坦的荒原，隨時等待資本主義與軍國主義的開發和徵用。僅見「非洲」而不見非洲的地方，同時反映的是我們對於非洲知識的稀缺與不在意，一如我們對於非洲人的認識是不分地域與國籍的「黑」。<sup>15</sup>

<sup>14</sup> 《戰狼 II》被推薦代表中國角逐 2018 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項，而《紅海行動》的攝製則受到解放軍的大力支持，包括出借艦艇與裝備，進行拍攝，頗帶有武力展示的意涵。

<sup>15</sup> 在這裡尚無法充份展開的討論是：「視非洲為一體」的視角，在知識上，是否有問題？雖然非洲聯盟的確實在，但它並不像歐盟有單一市場、貨幣與議會作為基礎，遑論非洲各國間在語言、部落、文化、宗教與殖民史上的差異。莫尤即曾指出，「非洲大陸往往被視為一個大國或一個區域，而這塊大陸上紛繁複雜的歷史以及當代政治經濟情況則被忽視了。事實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有著明顯不同的政治、人口、經濟和資源，這些特質吸引著各式各樣的外國投資者，而中國只是其中之一」（2017: 97）。的確，中非關係的開展在各個非洲國家並不相同，視之為一體或許更大程度反映的是中國對於非洲政經

因此，2017 年春節聯歡晚會上讚揚中非友好的短劇小品「同喜同樂」會引發軒然大波，也就不令人那麼意外了。《南華早報》指責這個短劇帶有「種族歧視」，並造成人們對「扮黑臉與大屁股的憤怒」。<sup>16</sup>名為「SupChina」的網路平台則責怪該小品「無恥」，是「這個星期上最多人觀看的節目中的低點」。<sup>17</sup>美國的《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也報導了這則新聞，將這起事件置放在中非關係中來理解，並捎帶提到自 2016 年以來，中國媒體與社會對非洲的負面再現，包括一個洗衣精的電視廣告以及在武漢展出的一個非洲動物攝影展；前者暗諷連黑皮膚都洗得掉，後者則將非洲人與猿猴、猩猩並置，強調其原始與落後。<sup>18</sup>這些批判不只發生在英語媒體，也在像微博、微信這樣的中文網路平台上發酵，引發正反辯論。

不論認為「同喜同樂」對非洲人的再現只是「為了喜劇效果」，「沒什麼大不了的」這樣的想法是否強辭奪理，或是認為中國人種族歧視的看法實在過於嚴肅，乃至於出格，或許比較持平的判斷是：劇組人員對於種族主義缺乏「文化敏感」，對於黑人在西方種族再現的漫長歷史缺乏認識與同情。小品裡「扮黑臉」與「大屁股」的作為不只重覆了西方的種族主義觀點，流露了中國對於他們宣稱所關心的「黑人兄弟」的歷史與情感缺乏認識，更強化了這類再現本身的種族化結構，而華人自己恰恰也曾受到這個種族化結構的折磨：從「東亞病夫」、「黃禍」、「模範少數」到「菜鳥新移民」，這些標籤都是上個世紀華人以及亞裔美國人試圖打破與超越的刻板印象，至今仍然未竟全功。更重要的是，「同喜同樂」反映中國對於非洲想像的接受本身缺乏批判意識，既看不到它是西方媒體長期主導下的產物，也沒有認識到它本身反映的是一種已經被地緣政治化的知識；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媒體非但無意改變這樣的知識結構，反而隨之起舞，堂而皇之地演出了一齣自以為中非友好的短劇。其中的諷刺正在於，儘管中國政府對於西方媒體抨擊中國的舉措相當敏感，以至於要求中國媒體與知識界要「說好中國故事」，中國媒體自身卻在製造自己的霸權宰制，並藉以宣稱與非洲友好。對非洲人民來說，看到自己被中國媒體如此呈現不僅令人傷懷，也讓他們對快速發展的中非關係充滿懷疑與不解，乃至

---

佈局的需要。

<sup>16</sup> Mimi Lau, “‘Racist’ Chinese Spring Festival Gala TV Show Causes Uproar over ‘Blackface’ and ‘Big Bottom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8/2/16): <http://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2133558/racist-chinese-spring-festival-gala-tv-show-causes-consternation>。

<sup>17</sup> Anthony Tao, “China’s CCTV Spring Festival Gala Included a Truly Shameless Africa Skit, Featuring Blackface,” *SupChina* (2018/2/16): <https://supchina.com/2018/02/16/cctv-spring-festival-gala-a-truly-shameless-africa-skit-blackface/>。

<sup>18</sup> See Jane Perlez, “With Blackface and Monkey Suit: Chinese Gala Causes Uproar,” *The New York Times* (2018/2/16): <https://www.nytimes.com/2018/02/16/world/asia/china-africa-blackface-lunar-new-year.html>; Adam Taylor, “China’s Televised New Year’s Gala Featured a Blackfaced Skit about Africans,” *The Washington Post* (2018/2/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8/02/16/chinas-televised-new-years-gala-featured-a-blackface-skit-about-africans/?utm\\_term=.3674a7f0589f](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8/02/16/chinas-televised-new-years-gala-featured-a-blackface-skit-about-africans/?utm_term=.3674a7f0589f)。

質疑過去 60 年中非友誼與連帶的歷史基礎是否只是嘴巴說說。一位在英國唸書的迦納留學生阿夫斯勾拉 (Seth Avusgola) 便認為，像《戰狼 II》這樣的電影表達的訊息不外是：中國已經來到世界的舞台上；它會保護海外僑民與自身的利益。同時，它對非洲描繪也是我們熟悉的。但是這種單一的觀點並沒有幫助；中國自視為與西方不同的外國勢力，但這部電影卻完全無法傳達這樣的訊息。<sup>19</sup>或許這也是為什麼如《戰狼 II》與《紅海行動》這樣的救援電影在中國獲得如此注目，卻在中國以外顯得落寞的原因：在中國男子氣概的讚揚下隱藏著對種族主義與恐怖主義的恐懼，因為中國及其人民很可能成為其目標。但就對非洲的認識而言，令人遺憾的，中國電影似乎並沒有超越好萊塢的水平。這就讓我們不禁好奇，究竟中國民眾是透過哪些管道認識非洲的，中國的非洲想像與故事，與西方又有何不同？

### 從發現到孤獨：中國旅行書寫裡的非洲

早先我一想到非洲，腦海中涌出的畫面大致有這麼幾幅。黑如漆墨的當地人、荒蕪的草原，無盡的沙漠，還有驚慌蹦跑的羚羊和懶散偉岸的雄獅……哦，說不定你也是這樣想的。我們都是《動物世界》的擁躉。骨瘦如柴的百姓、鐵皮房頂的城市、愛滋病的泛濫和埃博拉的高死亡率、赤裸上身的原始部落居民和政變……哦，你是個關心世界風雲的人，每晚都會看《新聞聯播》。

——畢淑敏，《非洲三萬里》，7

每天晚上，等在首都機場準備前往非洲的人滿坑滿谷。他們穿著自己最好的衣服，却掩蓋不了去出賣體力的事實。非洲急需建設，中國工人作為基建大軍，大量擁入非洲。然後，就像一滴水落在干涸的沙地上，飛快地沒了。

——蘆淼，《孤獨的時候，我們去非洲》，6

當然，這些高曝光度的影視產品並不代表「中國的非洲」之全貌。以上的討論也不只是為了批評中國傳媒的非洲再現陷於東方主義的框架。相反的，這僅僅構成了一個考察的起點，要求我們思考中國對於非洲的知識與想像究竟來自哪裡，又如何受到主體意識的中介？中國的非洲故事又如何反映中非關係以及中國人腦子裡的非洲？

---

<sup>19</sup> 見 Hui Man Chan, “On Wolf Warrior II: Thoughts from Africa,” *Cardiff University Journalism, Media, and Culture* blog, October 12 (2017): <http://www.jomec.co.uk/blog/on-wolf-warrior-2-thoughts-from-africa/>。



在中國崛起的數十年前，華人世界即對非洲及其他第三世界地區投以關注的眼神。台灣的三毛可能是華人世界第一個描寫非洲生活與文化，並廣受兩岸讀者歡迎的作家，儘管她的作品向來被放在「流浪文學」、「旅行文學」或「流行文學」的框架中理解。<sup>20</sup> 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來》、《稻草人手記》、《哭泣的駱駝》、《溫柔的夜》等書描寫的就是她在 1960 年代在北非西班牙屬地（西撒哈拉與加納利群島）生活的故事。<sup>21</sup> 雖然三毛在故事裡也寫到了北非的貧窮與戰亂，但是她筆下的非洲人物鮮少有刻板的龍套角色，而多是活生生、有思想與主張的個體，為華人世界的非洲想像提供了有溫度與深度的思想資源。然而，儘管三毛去世後並沒有被華人讀者遺忘，<sup>22</sup> 但我們絕少從中非關係的歷史視野中去看待她的作品，也往往忽略她在非洲寫作的 1970 年代，所謂的中非關係仍是一個三角關係，兩岸透過各項援助計畫正在非洲競逐國際支持。<sup>23</sup> 簡言之，即令三毛的作品稱不上「非洲研究」，但她浪漫行旅的非洲采風與國際背景仍然構成了當前中非關係的史前史，值得進一步的考掘。

近年來，部份由於中國崛起以及中非關係大幅進展，部份由於中國主體意識在變動

<sup>20</sup> 比方說，在台灣出版的六本碩士論文，儘管主題不一，都是從旅行書寫、流浪文學與流行文學等角度出發研究三毛的作品。在華藝線上圖書館可以搜尋到的相關期刊論文，多數也持類似的觀點。

<sup>21</sup> 三毛當時生活的地方是西撒哈拉。1886 年，這塊地方被劃為西班牙的保護領地，並在 1958 年成為海外省。1975 年，西班牙和摩洛哥、茅利塔尼亞簽訂馬德里協議，準備離開。1976 年，西班牙撤出西屬撒哈拉，其後大部分領土被鄰國摩洛哥佔領，三毛也因此搬到西屬加納利群島居住，直到 1981 年回台灣定居。

<sup>22</sup> 2000 年，三毛遺物被收入後來的台灣國家文學館中典藏；原來出版三毛作品的皇冠也在 2010 年以「三毛典藏」重新出版她的著作，並授權北京出版集團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於 2017 年出版三毛全集，共 14 冊。

<sup>23</sup> 見劉曉鵬，〈回顧一九六〇年代中華民國農技外交〉，《問題與研究》44.2 (2005)，頁 131-145；以及〈一種刻板印象，兩種不同政策：比較兩岸在非洲的「神農」們〉，《中國大陸研究》59.2 (2016)，頁 1-35。

中的世界裡更為增強，非洲之於中國不再是黑暗的大陸，而是遙遠的他方；非洲的意義也逐漸從政治經濟領域滲透進文化領域。近兩年陸續出現的非洲遊記或可為證。畢淑敏是中國的「一級作家」，以其西藏書寫而聞名。她在 2016 年出版了《非洲三萬里》（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記述她在非洲行旅的經驗。她兒子蘆淼與之同行，也於同年出版了《孤獨的時候我們去非洲》（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著名的海外作家嚴歌苓也在 2016 年出版了《非洲手記》（北京：人民出版社），記述她陪美國丈夫在非洲派駐的經驗與觀察。曾在非洲的中國國企工作的八〇後作家黃河清則在 2017 年的一月出版了《非洲歸來不必遠方》（廈門：鷺江出版社）。幾個月後，曾在奈及內亞從事農業與技術支援工作的渤文也出版一本《我在非洲的一千零一夜》（北京：團結出版社）。雖然可能有更多的作品尚未面世，我也可能錯過了一些稍早的作品，但是僅在這一兩年內的中國旅遊書寫就出現了五本關於非洲的遊記，這件事本身或許就值得思考。也許這意味著中國對非洲相關的知識有更大的興趣與渴望——至少，讀者渴望看到更多關於非洲的故事與圖片。事實上，《非洲歸來不必遠方》是這五本當中，唯一除了封面以外沒有任何圖片的一本，而在其他四本裡，圖片的重要性不亞於文字敘述本身。這些遊記的內容各有視角、觀察與體會，但是儘管經驗不同，這些作品卻意外一致地呈現了兩大主題：發現與孤獨。

「發現」這個主題不難理解，即令它本身意義複雜。如同這些作者注意到的，中國人對非洲的第一印象大都來自「發現頻道」（Discovery Channel）上的「動物奇觀」節目，在這裡頭非洲被呈現為一個景緻壯麗、野性的大陸：睡獅、奔鹿、漫步的象群，當然還有捶胸頓足的猩猩。非洲的「發現」因而必須從超越「發現頻道」開始。然而，誠如畢淑敏的《非洲三萬里》所示，克服非洲刻板印象的第一步很快地就與非洲的現實捆綁在一起——貧窮、髒亂，甚至是混亂。事實上，對任何有意去非洲的人來說，進入非洲前要出示黃色的疫苗接種證明這件事本身，就不斷提醒自己非洲是疾病的大陸，而不要靠近貧民區、小心劫匪與個人安全等的各式警告，也在強化非洲並不安全的印象。換句話說，在「發現頻道」背後的真實非洲或許並不美麗，而且更為「野性」，因此希望超越刻板印象的企圖很快地被更為流行的刻板印象所置換。

在畢淑敏和蘆淼的作品里，「發現」同時意味著收集故事——從名為「露西」的第一個人類骨骸、南非貧民窟、火車「非洲之傲」的風情，到非洲殖民者與西方銀行家羅德斯（Cecil Rhodes）的故事、波耳戰爭、曼德拉的修行與氣度，乃至一般人的故事——這些故事企圖展現一個不同於「發現頻道」的非洲，以揭示非洲社會的種族與階級動態，並且凝聚一種同情，而不是團結的觀點；非洲不只是一片廣袤無邊的大陸，而是不同個人——從殖民探險家、非洲部落到中國工人與商人——故事的集合。畢淑敏如此總結她的非洲之旅，「旅行就是聽故事。聽不同的故事，聽沒有聽到過的故事，聽他人的故事」（368）；她強調，「旅行本身就是不斷碰撞記憶的過程。沒有回憶的旅程，不能算

作優質的旅行」(256)。換言之，旅行一方面是收集故事（一如收集各類紀念品）的活動，同時也是製造記憶的行動——將他人的故事變成自己的記憶，在畢淑敏看來，恰恰是旅行的本質，或是說優質旅行的必要條件。隨著她所收集的故事與製造的記憶，讀者們也成為故事與記憶的收藏家；他們不只見證與發現，同時也感受，反思與記憶非洲。但是中國讀者們究竟記得非洲的什麼，他們的反思又反映了些什麼？

由於畢淑敏與蘆淼一同旅行，所以他倆的遊記分享了共同的行程，由南非入境，搭乘火車「非洲之傲」一路向北，以走上坦贊鐵路為敘事的高潮，並在坦尚尼亞的德累斯莎朗姆結束旅程。畢淑敏的記述較為細膩，對當地的風土民情、文史地理有較多的考察與介紹，並在非洲的故事當中提煉人生的智慧。相較之下，蘆淼的記述較為零碎，文字略為滑頭，書中不斷出現，用來分段的引文有時也顯得多餘而做作。儘管兩人筆下多是非洲的景物與旅途的人事，但非洲景物中的中國身影——「非洲之傲」的「綠皮火車」內核，坦贊鐵路的鐵軌與枕木，乃至中國工人和移民等——仍然是他們心頭揮之不去的念想。換句話說，這兩部遊記裡的另一個重要「發現」其實是在非洲大陸上的「中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製〉這一章裡，畢淑敏帶著讀者坐上坦贊鐵路，那是 1970 年代中國人民餓著肚子為贊比亞的非洲兄弟們蓋的一條鐵路。藉著描述坦贊鐵路今日的狀況，畢淑敏帶著讀者走進時光隧道回憶她自己的 1970 年代以及當時中國建造這條鐵路的原因。她宣稱坦贊鐵路是「屬於我們那個年代的紀念」(251)。畢淑敏回憶：當時中國非常貧窮，窮到她在西藏的同志們樂於在離開部隊前割盲腸，因為割掉盲腸，每個人可以獲得兩百塊人民幣的補償。儘管窮困至斯，寧可割肉換錢，中國卻毅然決然地要為非洲兄弟蓋鐵路，只因為他們向世界銀行貸款遭拒、向蘇聯求援被否，而且極需要一條鐵路來推進自身經濟的發展。這是中國人民願意勒緊褲帶，全心全意幫助非洲人民的時代。但是新禧年到來後，坦贊鐵路很快地失去了昔日的光采，因為贊比亞不再需要它來運送銅礦到國外，而中非友誼的願景也慢慢在記憶中淡去。坦贊鐵路的故事也是畢淑敏珍惜的回憶，而那正是今日中國所失去的，即令它也是中非關係中一再被提及的橋段，包括 2018 春晚小品「同喜同樂」亦以之為背景。同樣的，蘆淼也為坦贊鐵路寫了一段，但是他的理解卻有更多想像與虛飾的成份。他坦誠：坦贊鐵路「這詞離我實在太遠太遠。無論是從歷史還是地理上來說，都如此。我會和其他人說坦贊鐵路如何如何，這就像七月驕陽下的高中地理考試，滿嘴名詞彷彿地球就是自家後院，自己就是無所不知的秘書長，但實際上，貧瘠的大腦裡浮現的只是一行行枯燥的印刷體」(128)。即令如此，也不妨礙蘆淼對之大發思古幽情：「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來自那些沈睡在此地已經 40 年的鐵軌、道釘和枕木。它們似乎還帶著當初修建鐵路時中國人的喘息和汗水，帶著當時的塵土和海水的味道」(131)；「歷經風吹雨打，車廂已被風化腐蝕出一個個銹跡斑斑的大洞。雖然沒有漢字，但我仍然固執地認為，這些車皮，就是當年中國援助坦贊鐵路時

的車皮。這個車站給我的感覺就像一個沈默的墓地，讓人壓抑」(134)。墓地的比喻具體而微地解釋了坦贊鐵路的興衰，也暗示了中非友好時代的落幕，如今非洲更為形象的中國商品已不是鐵路，而是大量傾銷的便宜日用商品、手機，以及機場、體育館等大型的硬體建設。因此，如何評價坦贊鐵路遺產的問題，於是成為如何理解中非關係深層歷史的線索。然而，儘管坦贊鐵路構築了中非關係歷史上的基石，它同時也成為了一套修辭，或是用以導正中非關係發展的道路，或是用以遮掩中非關係中的實質剝削。顯然，在「發現頻道」之外，非洲的發現意味著重新發現在中非關係的發展與體驗中的中國主體性。

然而，這個主體性是如何構造的？它與非洲的關係，如果不是以友誼和連帶為基礎的話，又是如何表述的？蘆淼在〈龍在非洲〉這章的記述值得觀察與申論。他在開頭就寫道：「在這個世界上最善於背井離鄉然後落地生根的，我覺得不是猶太人，而是中國人」(220)。以他的非洲簽證反覆被找麻煩為起點，蘆淼指出，非洲國家之所以不給中國人發放落地簽證，是因為「他們怕根本控制不住中國人流入國內」；中國不只有基建大軍進駐非洲，更在非洲各個角落留下了許多的足跡與印記，成為「隱隱能夠影響民間局勢的一股力量」(223)。然而，這批來自中國的新移民「所做的不過是賣苦力」、「掙非洲錢的洋民工」(224)。他寫道：

我真不希望，我的同胞們向非洲輸出的，幾十年來永遠是這些體力勞動。非洲人自己不願意做、懶得做或者不屑於去做的工作，我們去做。西方人做不了、做不來、覺得做了虧本的工作，我們去做。這樣多傻。我真不希望，我們的同胞去做那些本來就應該是當地人做的工作。而且做了之後，還無法得到感激。他們會在口頭上說，呀，謝謝你們無私的援助，我們永遠是好朋友呢。但然後呢？然後就是全世界人都可以去自己的家裡坐坐，唯有好朋友不行。因為好朋友太能幹了，他如果來了，就可能會讓自己家人沒事可幹，儘管這些活兒可能擺在那裡，如果好朋友不來永遠也沒人幹。(228)

姑且不論蘆淼的這番表述是否符合現實，他此番感受其實來自兩個特定的歷史構造：一方面是中國積弱不振的百年陰影，衷心希望自己的同胞能夠擺脫勞苦奮鬥，為人刀俎的命運；另一方面則是種族主義壓迫的反抗，不願自己的同胞受到歧視與不公平的對待。問題是，在反抗積弱與歧視的同時，蘆淼或許沒有考慮的是，「因為自己太能幹而使得朋友沒事可幹」這樣的比喻本身可能也是一種種族主義；它非但沒有注意到非洲朋友敞開大門的期待與需要是什麼，也沒有考慮到援助與移民，一如探險與殖民，本不該是同

義反覆，而是兩種不同的行動；前者的正當未必得以證明後者的必要，而對後者的警惕也不必然意味著對前者的否定。重點或許不在於中國人能幹與否，勤儉無雙，而在於移動與交往當中的文化衝突往往反映了主體性的問題以及對待他者的態度問題。同樣的心情也在畢淑敏那兒有所反映。對於非洲同胞想憑英語到中國賺錢的想法，她頗感不以為然，即令她自己是不說英語的：「非洲普通黑人的英語常常是有口音的，還有些不合正統語法的口語。有時發音模糊，難以聽懂。他們把到中國教授英語當成新的致富之路，我個人覺得有點過於樂觀了。中國人求賢若渴不錯，但也不會孬好不分」（152-3）。雖然寫的含蓄，這段話的言外之意倒也無處隱藏。

認為非洲英語不夠「正統」或是非洲人不肯「吃苦」、不夠「勤勞」，當然都反映了中國人直觀的感受，但這些評價的背後，其實有一套根深蒂固的種族階序。非洲同胞雖然是我們的第三世界兄弟，但是在文化與文明，乃至於發展的程度，他們仍是被援助的對象，而不是平等交往的主體。依此邏輯，中國移民與資本進入非洲當然是文明開化之舉，只能是無私的援助，而非有意的侵佔；非洲是中國躍上世界的舞台，是聰明的中國人在中國之外追求發展的機會之地。不諳非洲語言，不會影響中國人到非洲發財，但是想到中國發展的非洲人，還是該乖乖到孔子學院學好漢語的。無怪乎，在維多利亞瀑布的山水秘境之前，蘆淼會發出如下的感嘆：「如果沒有利文斯通，非洲大陸的秘密或許要到很多年之後才能被人發現。有沒有可能，要等到衛星上天，才能找到非洲大陸內陸的那些巨大的湖泊和河流？」（103）。作為豐饒之地，似乎非洲的美好只能被外人發現，而非洲的機會仍然不屬於非洲。<sup>24</sup>

有趣的是，這個沿著中非關係發展與體驗中出現的中國主體性，卻往往以「孤獨」的修辭來表述自己。年輕一代的作家尤其如此。蘆淼的《孤獨的時候我們去非洲》可謂其中代表。蘆淼不只在書名上將孤獨的感受與非洲掛勾，更在內文裡表述了一個詩意、自省的自我，將他與母親同行的非洲之旅表述為一趟靈魂探索的旅程。於是，儘管蘆淼的遊記與畢淑敏的《非洲三萬裡》在內容與視角上有諸多雷同之處——都是故事的收集——蘆淼的敘事更傾向於建立一種主體性，一種排斥各種事先計畫，只聽從內心的主體表現。在附錄〈走進非洲之前〉裡，蘆淼寫到旅行就像職業生涯規劃那樣，各人雖有不同，但高下可見。有些人走的是安穩的路線，以攢簽證章為目的，另一種則「劍走偏鋒，

<sup>24</sup> 雖然這裡的分析以畢淑敏和蘆淼的遊記為對象，但這類種族主義心態不是中國公民的專利，而是華人社會中普遍的態度。劉曉鵬在討論台灣在非洲的農技援助時就曾指出當時的種族主義心態；見〈農技援助之外：小中國對非洲的大想像〉，《臺灣史研究》19.2 (2012)，頁 141-171。陳光興在《去帝國》（台北：行人，2006）中則使用「漢人種族歧視」（424）一詞，一方面強調「漢人」為中國主導性人口，以及中華文化的傳承與流佈主要是以漢人為基礎的事實，另一方面也使之與境外的海外華人與境內的少數民族有所區辨，畢竟這兩者的處境不同，也往往處於漢人種族與文明階序的下方和外緣。陳光興企圖回到中華帝國與漢人世界觀的脈絡中，梳理種族歧視的問題，並強調這樣的種族文化主體形構與帝國歷史的關聯。同樣的，本文對種族主義的批評無意針對中國公民，而是著眼於台灣及其他海外華人社群也分享和承繼的漢人文化種族潛意識。關於這點，我會在「結語」一節再做申論。



什麼地方有挑戰什麼地方難去，就專揀這些地方去……這類人就有點兒像職業生涯裡的自我創業者。不願意受別人的規則的約束，寧願自己冒風險去打拚，是這類旅行者的特點」(19)。像其他旅遊書一樣，蘆淼也以「老司機」的姿態提供讀者行前規劃的「實用資訊」(簽證手續、貨幣策略、行程規劃等)，但是以上的表述卻突出了一種行旅主體的姿態，強調一種自我創業者的孤傲、不受規束，而非洲正是這類旅行者的心之所向。在這個意義上，孤獨來自於想要走一條沒人走過的路的想像，以及自我探索的期待，而非洲在旅行上所提供的挑戰恰恰最適合這些創業家類型的旅人。在此，旅行安排與生涯規劃被巧妙地與中非關係勾連了起來，非洲被投射為一個挑戰之域，一個挑戰自我、完成自我的新天新地。當然，這些投射沒有對錯可言，但孤獨修辭卻有效傳遞了種族潛意識裡的感受；這種感受與《戰狼 II》與《紅海行動》沒有太大的差別。

無獨有偶地，黃河清的《非洲歸來不必遠方》也在書末收錄了一篇實用資訊的章節，名為〈關於非洲工作生活的 Q&A〉，但其目的並不是要告訴讀者如何規劃行程、辦理簽證，而是透過一連串的問題來協助讀者自剖與考慮是否要到非洲工作和生活。這一方面顯現到非洲工作已然成為當前中國公民的就業選項之一，另一方面也突出既有的非洲想像對有意前往非洲者的制約。但是，在眾多的考慮中，黃河清強調，核心的問題不是非洲安不安全、文化適應是否困難，而是「我的孤獨值多少錢？」(279)。這是一個有趣、深刻，甚至帶點哲學意味的問題。但它也暗示了到非洲工作本身就是一種「犧牲」，而這樣的犧牲只能以薪資所得來計數與衡量，因為在非洲的工作經驗是無法被轉移到其他的工作上；在非洲工作的風險也確實比其他地方來得高；最重要的，孤獨本身就是最大的挑戰，連科技的進展也難以彌補和改善。而這本書的內容恰恰就是關於在非洲工作的中國國企員工如何面對日以繼夜的孤獨。蘆淼將非洲視為挑戰之域，黃河清則將之加碼為生命的賭注。在半殖民場景裡的這個賭注，其目的不外是為了更快地謀求中產階級的薪資與生活；去非洲的目的不是為了體驗非洲或孤獨，而是為了從非洲歸來，不再遠方。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孤獨」不只是一種清冷寂寥的感受，而是一種主體的裝置；這個主體與當下的環境是陌生而疏離的，但他又需要這樣的陌生與疏離來證實自己的存在。如黃河清說的，「即便有的老非讓我見面就想退避三舍，而有的老非又給我提供了極端舒適的生活。老非終歸是老非，我終歸是我」(34)。其實，主體並不真的孤獨，只是需要孤獨的襯托。

### 「民族誌瞬間」

命運就是這麼有意思，把我這麼一個人發配到了大洋彼岸那些個荒蠻未開

化之地，讓我想不旅游都不行。我在這樣的世界裡竟然有了些審問自己、凝視星空的時間。

——黃河清，《非洲歸來不必遠方》，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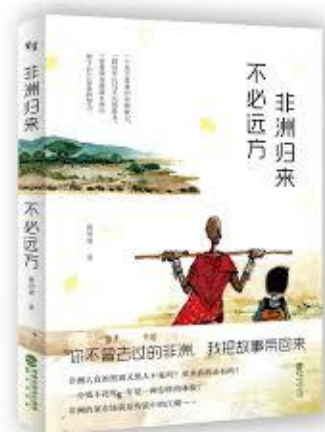
相較於蘆淼與畢淑敏的遊記，黃河清這本書更接近於民族誌書寫，不過它記錄的對象不是非洲及其人民，而是在非洲的國企員工。如果說遊記是一種主觀化的採風，是作者對他者與地景的凝視，那麼民族誌，在 1980 年代的反身性轉向之前，<sup>25</sup>是自許為客觀的再現模式，是將自我從其凝視中拔除的一種他者書寫。文化人類學家克里佛 (James Clifford) 就指出，「只要民族誌的任務是將陌生的文化變得可以理解，那麼它永遠不能被限定為一種科學的描述」(101)；相反的，我們必須認識到民族誌的文本性與寓言性，亦即它是一種描述與再現他者的「故事」，本身就糅雜了客觀的現實與主觀的認識。<sup>26</sup>另一位人類學家史崔珊 (Marilyn Strathern) 則強調，民族誌書寫包含兩個田野，一個是作為研究對象的田野，另一個是作為書寫現場的田野，這兩個田野之間的互動構築了她所謂的「民族誌瞬間」(ethnographic moment)。換言之，作為一種知識的形式，民族誌並非純然客觀而科學，而是一種經過轉化的洞見。也因此，民族誌的意義不在於他者知識的積累，而在於反思的瞬間，在那既「沈浸於內，又游移於外的關係之中」(6)。<sup>27</sup>所以，當我試圖從民族誌的角度來理解黃河清的遊記時，我想強調的是一種糅雜的閱讀策略：一方面將書寫者本人置於書寫的場景裡，作為民族誌再現的一部分（例如作者與當地人的互動），另一方面注重作者自身的主體存在，亦即他對當地風土與當下事件的描述、感受與反思。不同於畢淑敏與蘆淼對收集故事的強調，彷彿自身只是外在於故事的收集者，在黃河清的作品裡，重要的不是故事，而是見證——不只是非洲的風土民情，更是中國國企及其員工在非洲的存在，以及他們為非洲帶來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審問自己、凝視星空」的孤獨既是主體的裝置，也是中非關係的寓言。

---

<sup>25</sup> 1980 年代，在後結構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北美的人類學家開始反思民族誌的文本性格，強調人類學家對於異文化知識的再現並非純然客觀，而有高度主觀的介入。一般認為，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主編的《書寫文化》(1986) 是推動民族誌反思的重要推手。

<sup>26</sup> James Clifford, "On Ethnographic Allegory,"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99-121。

<sup>27</sup> Marilyn Strathern, *Property, Substance and Effect: Anthropological Essays on Persons and Things* (London: Athlone Press, 1999)。



對黃河清來說，孤獨的構成是多重的：一方面是空間上的隔離，這包括了非洲與中國的空間阻隔以及國企員工與非洲人民生活空間的隔離；前者可能造成妻離子散的家庭悲劇，後者則會導致國企員工與非洲人民的緊張和矛盾；同時，感情與文化生活仰賴祖國的補給亦會強化人在異鄉的孤寂。另一方面，中國國企與非洲政經緊密而複雜的關係，以及幾乎是根深蒂固的種族心態，更使得派駐非洲的國企員工形成一個極小的社交圈，若不與同事相濡以沫，彼此安慰，就只能相忘江湖，自度傷悲。如此隔離的體制性安排製造與強化了中國人特別「吃苦耐勞」的意識型態，乃至形成一種「集體的禁欲主義」。李靜君（Ching Kwan Lee）的研究就顯示：在非洲的中國工人普遍居住在當地人稱之為「中國屋」的集體住宅裡，如此隔離的居住狀態使得中國工人都是囚犯的流言，在當地甚囂塵上，而這樣的道德批判，在海外的中國移工眼裡，則強化了中國人被外國人羞辱與歧視的感受，使得他們更以「吃苦」作為民族身份與道德邊界的識別標誌（157）。於是，隔離本身就成為中國在非洲的寓言。黃河清以極為淺白的文字寫道：

中國在非洲的投資與其說是援非，不如說是救己。……一方面，近期內中國對非洲的援助完全通過中國進出口銀行直接撥款給相關企業，也就是說錢完全不經過老非們的手，而是直接從中國銀行轉到中國企業的手裡。因此當地的深度腐敗對此基本沒有影響。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在收到錢後，基本又全部投回了國內。項目設備的進口以及人員的僱傭，基本上還是以國內的廠家和中國人為絕對的主導。因此錢轉了一圈又回到了中國人自己的手裡，所以流到外人田裡的肥水，只是極小一部份。（28-29）

如果說資本的跨國流動，以援助之名，繞了一圈，還是在中國人的手裡，那麼在非洲設立公司與工廠、進行基建的中國企業總要與非洲人民有所互動吧。對此，黃河清則有以下的表述：

在這一點上，我們公司採取的方針政策一直都是「中國人的項目當然應該由中國人來建！老非出體力就可以了！」因此一般的工程全都是由中國人負責管理層，高層僱用老非更是絕對不可能的，不管來的人多優秀，總會有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感覺。即便和少數的老非合作，也是一種以黑治黑的心態，依靠那些老非的能量來對抗當地許多不合理的現象。(219)

易言之，國企員工在非洲感到的孤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運作與種族主義的結果。儘管來到非洲，中國國企仍然是以中國的方式運作，不僅資金與人力來自中國，連心態也沒有因為時空轉換而有所改變。「以夷制夷」仍是百年不變的對外策略，「肥水不落外人田」的老祖宗智慧也仍然主導著援外的思路。<sup>28</sup>也因此，在行文上，黃河清對自身的種族潛意識直言不諱，不但直指非洲髒與窮，連非洲人的體味也毫不客氣地批評。他將非洲人民分為五等，最下等者，他直言，是無法交流的，因為「當我們用憐憫的眼神看著他們在微不足道的小事面前瑟瑟發抖時，他們也會用憐憫的眼神看著我們為著虛幻的未來東奔西走」，而那些「整天無所事事閑逛的，在你車前敲打著玻璃要錢的，把握一切機會對你進行勒索的」則是稍上一等的老非，因為「他們既沒有步入現代化的機會，也失去了安貧樂道的平常心」；再上一等者是從西方與中國留學歸國的非洲知識青年，他們儘管對環境憤恨不平，卻無力改變大局；最上兩等的則是皇親國戚與各方權貴（30-3）。

雖然作者的焦點是國企員工在海外面對孤獨的心路歷程，非洲種種只是花絮，但這反倒賦予了這部作品「見證」的意味，從而促成了「審問自己」的可能。在〈老板發威整拆遷〉這一章裡，作者描述中國國企在非洲發展的一個重要現場。作者受命要與剛果當地村落的一個非洲靈媒接觸，以說服村落百姓搬遷，讓國企進駐開發，架設電塔，因為當地百姓相信，地有祖靈，不能隨意拆遷，而這位靈媒或可與祖靈溝通，打通門路。在這個過程中，不僅作者發現這個靈媒曾經留學中國，獲得北京清華水利工程的博士學位，他也明白了村民的抗爭並不是為了討價還價、索求賠償而演出的戲碼。可是就在他說服了靈媒前往現場的當下，他赫然發現老板早已聯繫好剛果軍方，強行拆遷。眼見靈媒因為村落拆遷而瘋顛，他明白了自己所為不過是公司的備案，也因此自己成為強行拆遷的同謀——不管靈媒靈或不靈，拆遷都是必然。帶著一點同情與更多的世故，他寫道：

「趙總！都拆完啦！」遠遠傳來一聲呼喊，聽聲音是趙總下屬管工程的王

---

<sup>28</sup> 這也是國際媒體對中國在非洲常見的批評，亦即中國的援助是一種變相的交換與剝削，以及中國的投資並沒有進行技術移轉，也沒有為非洲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

經理，這聲音標志著他沒有因為胡拆這裡褻瀆神靈慘遭不測，也標誌著這次搬遷工程的結束。不久之後，這邊便會被剛果河的水所淹沒，不管是否真的有靈，都已不會再有，靈是否真會哭號，也不再被人聽見。不管世界有多少種解釋，勝者永為王侯，敗者終生為流寇，所謂自由之靈，自此湮消雲散。(256)

黃河清的描述，在這裡，遠遠逸出了「遊記」的範疇，而展現了某種的「民族誌瞬間」，讓我們看到發展的代價如此沈痛，以及作者見證苦難之後的人生體悟。然而，作者不只是個旁觀者與記錄者，他更是這個事件的參與者。他無力扭轉事情的發展，也無意為村民的命運做出更多的努力，但他畢竟為那些不可知的祖靈留下了一點悲憫的「見證」，並對「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大道理予以嘲諷；他讓我們看到，即令發展的步調無法停止，發展造成的「不安」仍然值得我們關注與思考。因此，我們不能不在他的悲憫與世故之間把握分寸。作為讀者，我們或許同樣無力抵擋發展與拆遷的巨輪，甚至羞於承認在其中獲得的好處，但我們或許都該捫心自問：在悲憫與世故之間如何把握自己，如何與時代共進，又保持距離。儘管作者未必有任何反思的企圖，也未曾深入檢視自身的種族意識，只是單純地分享自己的見聞與體會；然而，恰恰是這樣一個含括自身在內的視角，提供了一種感性的見證，迫使讀者思考「中國在非洲」的意義，以及它與「中國的非洲」之間的關聯。

### 結語：「世界中的中國」與其不安

「向南看」(Looking South) 政策是成功還是失敗，就取決於它是支持非洲大陸的自主發展計畫，抑或深化其與世界經濟的融合。

——莫約、耶羅斯、傑哈，〈帝國主義與原始積累〉，133<sup>29</sup>

2018年10月15日，《紐約時報》報導了一則消息，在國際社會引起嘩然。<sup>30</sup>一名在奈洛比郊區的中國機車工廠擔任銷售員的肯亞員工，歐強先生(Orchieng)指稱，與

---

<sup>29</sup> 薩姆·莫約(Sam Moyo)、帕里斯·耶羅斯(Paris Yeros)、普拉文·傑哈(Praveen Jha)著，陳耀宗譯，〈帝國主義與原始積累：關於新非洲爭奪戰的筆記〉，《人間思想》(繁體版)第11期(2015)，頁117-136。

<sup>30</sup> Joseph Goldstein, "Kenians Say Chinese Investment Brings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5,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10/15/world/africa/kenya-china-racism.html?emc=edit\\_mbau\\_20181015&nl=morning-briefing-australia&nlid=6210613320181015&te=1&fbclid=IwAR2EDGzCS1f\\_LPBoXqayt\\_8iCS58RWDKLnkoCVXko dRjmouFTPDy-HzYwE](https://www.nytimes.com/2018/10/15/world/africa/kenya-china-racism.html?emc=edit_mbau_20181015&nl=morning-briefing-australia&nlid=6210613320181015&te=1&fbclid=IwAR2EDGzCS1f_LPBoXqayt_8iCS58RWDKLnkoCVXko dRjmouFTPDy-HzYwE)。

他年紀相仿的中國上司叫他「猴子」，令他感到歧視與難堪。事情是這樣的：在一趟公務旅行中，歐強與上司看到一群猴子在路邊，上司就叫道：「你的兄弟」，要他分一些香蕉給牠們。類似的狀況一再發生，於是歐強錄下了一段他與上司的對話放在網上。在這段對話中，上司不斷強調黑人如猴子一般，並且以西方曾經殖民肯亞為理由，拒絕承認肯亞的黑人應該被平等對待。毫無意外地，這樣的言論立即在網路上引發熱議，而這位上司也於隔天被遣送離境。雖然遣送的處置可謂果斷，但歧視的印記卻不容易消除。最令人不安的是他毫無遮掩的種族潛意識，強調黑人髒、窮、笨、又有體味，一如黃河清在書裡的描述，而這位中國上司之所以敢於如此放肆，是因為「他不在乎，也不屬於這裡」。

這個事件讓我們明白，黃河清的記述不只代表了他自己，也一定程度地表述了部分在非中國工人的心聲，而這恰恰是中國在非洲最為人詬病的地方。傅好文（Howard W. French）在《中國的第二個大陸》中最核心的批評也在這裡：在非洲「中國並沒有與西方的家長作風分道揚鑣，而是如一般所批評的，取而代之。非洲人並不真的是兄弟。一點也不。在友好的面具下，中國官員把非洲人當成小孩，認為他們只能夠緩步行走，得用糖和幼稚的語言誘使前進」（221）。劉曉鵬的系列研究也顯示，早在 1960 年代，當台灣仍與中國在非洲競爭外交支持的時候，「台灣也在非洲建立了台灣版的『殖民論述』，認定自己所代表的中國足以領導『落後的』非洲」（2012: 143）；雖然表面上，台灣對非洲的農業技術援助是以孫中山的「扶助弱小民族」為指歸，但實際上，從當時的新聞局長到非洲各國的公使，都對非洲人投以歧視的眼光，認為他們「自大、倨傲、混亂、骯髒而沒有責任感」（2012: 146-147）；連當時的台灣媒體也提出移民非洲，協助開墾的呼聲，以解決非洲國家缺糧的問題，相信台灣可以派出「大量青年像漢代的張騫班超一樣，前往非洲宣揚我文化並幫助他們」（2012: 154）。當然，1960 年代的台灣與當前的中國無法相提並論，但在對非洲社會的認識以及推動雙邊交往的論述卻是如此的相似，以致我們不能不承認某種種族潛意識確實在作用著，形塑著漢人對黑人的感覺與認知結構。姑且不論中國在非洲是否真如西方媒體所說形成了新的殖民主義，或是如李靜君描述的只是「國家資本」在獲取最大利益與執行國家政策之間所表現出的矛盾行為，我們大概都無法否認這些資本與國家行為也受到種族潛意識的左右，而且國家資本的理性要求還不斷地透過體制性的安排——包括居住空間、勞動與僱傭的種族性區別、乃至於資本流動與資源交換的契約行為——強化了種族潛意識，儘管表面上的官方論述恰恰相反。如果我們不能對自身的種族潛意識進行反省和警惕，再多的援助承諾與美好願景都無法改變非洲社會與西方媒體對中國的質疑和警誡，中國深入世界的過程只會更為崎嶇而扭曲，即令我們仍願意相信前途是光明的。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在非洲不僅如李靜君所言，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一次事件，

它也是中國走向世界，重返榮耀的里程碑。李靜君強調，「中國國家資本的向外流動只是全球中國的一個例子」，在對外經貿投資外，「中國的全球性存在以多元的形式在不同的場域中展現：人口移動，全球的傳媒網絡、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多邊的區域與全球信用機構以及中國非政府組織在海外的拓展等等」（165-166）。這意味著我們對於中國的研究與理解不能再侷限於中國境內，而要從國際互動的具體脈絡中重新理解中國。換言之，「世界中的中國」（global China）將成為一個新的命題與學術領域，這也意味我們必須認真面對「中國在非洲」與「中國的非洲」之間的關聯，從外部出發打開內部的秘密。處於中國內外夾縫中的台灣學者來說，這意味著既不放棄介入改造中國的責任，也不忽視自身既內且外的曖昧處境；此外，更應該如陳光興所建議的，「善用綁在我們身上、甩不開的身分認同，從內部發言，讓自身所屬的群體能夠積極面對問題」（436）。

作為一個知識與政治的命題，中國的非洲最終追問的仍是中國的問題；它是一個鍛鍊跨文化、跨種性感性的挑戰，是在政治與經濟之外對「世界中的中國」的另一種要求。這或許正是思想第三世界在當前局勢中的意義：一方面對我們據以認識世界的媒介保持警醒，另一方面不斷追問與自省我們和世界的關係。或許面對「世界中的中國」及其不安，探其根源、溯其變異，正是我們得以出發的起點。

## 銘謝

本文最初以英文發表於杭州中國美術學院亞非拉文化藝術研究院，於 2018 年 6 月 1-2 日所舉辦的「思想第三世界：藝術、翻譯與媒體」國際工作坊。感謝與會朋友們的討論與分享，尤其是高士明副院長對工作坊的支持，以及唐曉琳博士、曹梅清、姚雨辰、李佳霖、彭婉昕的協助。之後，又以「華人穿非衫：今日中國的非洲之初步觀察」為題，於 2018 年 6 月 22 日在金華的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發表。特別感謝雷雯老師的邀請，以及浙師大朋友們——張勇、徐薇、章亮瑩、黃金寬等——的批評與討論。筆者受益匪淺。最後，感謝陳光興多年來的啟發、鼓勵與支持。沒有他的敦促與推動，這篇文章是不會出現的。